

中国共产党与台湾 (1925-1950)

罗燕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 本文根据有关档案、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 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共与台湾地区的关系, 包括中共与台共、台盟、“二·二八”起义的关系, 中共对台工作的基本线索、工作机构、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中共对台政策的转变, 关于台湾必须回归祖国这一主张的来源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台湾; 台共; 台盟

DOI: 10.3969/J.ISSN.1672-0911.2021.03.022

中图分类号: D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911(2021)03-0022-08

日本侵略者占据台湾以来, 台湾同胞从未屈服过异族统治, 始终视己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岛内反抗侵略者的斗争断断续续, 时而兴起, 时而低落。清末, 台湾同胞的反抗几乎没有得到大陆朝野政治力量的支持, 处在自生自灭的孤军作战状态。民初这种状况有所改善。台湾的革命者, 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受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召唤, 来大陆求学就业, 参加国共两党及其他革命组织, 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努力将这些斗争引入岛内, 与大陆同胞一起在两岸成立了以光复台湾为目标的各种抗日组织。他们已经意识到: “若要救台湾, 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可! 欲致力于台湾革命运动, 非先致力于中国革命成功。待中国强大时候, 台湾才有回复之时。待中国有势力时候, 台湾人才能脱离日本强盗的束缚。”^[14]

一、中共受托领导台共建党

中国共产党接触台湾问题是从成立台湾共产党开始的。1925年11月, 中共中央派遣台籍党员谢雪红和林木顺随中共旅莫支部赴苏留学, 进入

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任务是学成之后“在台湾建党”^[15]。两人到莫斯科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共产国际根据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则, 决定由日共, 而非中共, 筹建台湾共产党。1928年2月, 日共中央全力关注当前的选举运动, 决定委托中共中央领导台共建党。中共中央接受了委托, 派出中共代表彭荣^①出席台共一大。

1928年4月15日, 台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开, 与会代表共9人, 包括中共代表彭荣和朝共代表吕运亨。其余7人为台共代表, 他们是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陈来旺、林日高、潘钦信、张茂良, 分别代表分散在上海、厦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东京等地的18名党员。在18名党员中, 有中共背景的11人, 有日共背景的3人。

大会由谢雪红主持。中共代表彭荣在大会上作报告和总结。他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去及现况, 分析了国共从合作到分裂的历史教训, 强调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解答了台共代表的提问。他肯定了台共成立的意义, 指出了台共存在

的两个问题：一是台共在上海创立，远离台湾的实际斗争，台共党员应尽可能地回台开展活动。二是台共党员全是学生，没有一名工人，应注意吸收工农分子入党。台共代表同意中共代表的意见。

大会讨论通过了《政治纲领》《组织纲领》以及关于工运、农运、青运等问题方针的文件。《政治纲领》提出“台湾革命阶段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全民革命，而是集中一切革命的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实现台湾独立”，“实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残余势力”^{[1]35}。

大会产生了首届中央委员会。林木顺、林日高、蔡孝乾、庄春火、洪朝宗 5 人当选中委。谢雪红、翁泽生当选候补中委。4 月 18 日，台共一届一中全会进行了工作分工。林木顺任书记长，林、林、蔡 3 人为中央常委，翁驻上海负责联络中共，谢驻东京联络日共。

台共建立后即回台湾开展了抗日斗争和阶级斗争，发展了数十名党员，组织领导了文化协会、农民组合、台湾机械工联合会、台湾工友总联盟等团体，在台湾光复史上写下重要一笔。1929 年和 1931 年，台日当局两次发动“台共大检肃”，破获了台共组织，逮捕了大批干部。加上策略分歧导致内部分裂，台共只存在了 4 年多时间，党员最多时不足百人，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至 1931 年秋天便瓦解了。

台共失败大致有四方面原因。一是先天不足。共产国际、中共、日共三家对台湾问题和台湾革命都缺乏经验及深入了解。共产国际领导脱离实际，日共是一个秘密工作的政党，中共当时是一个武装斗争的党，导致台共在策略上无所适从。二是领导关系不顺。台共在组织上隶属日共，在思想和政治上受到中共中央的领导，结果两头无法照应周全。三是当时中共本身也不成熟，尚未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只能向台共提供土地革命及苏运经验，不足以应对岛内抗日的需要。四是台共政治纲领的局限。台共提出“台湾独立”的目标，是为了推翻日本的殖民统治，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建立工农政权，与今天“台独”分子分割台湾与祖国大陆的主张有天壤之别，但仍是寻唐景崧、刘永福建立

台湾民主国之旧迹^②。从历史上看，台湾民众依靠自身力量不足以实现救台，只有汇入中国革命，救台先救国才是出路。台共依靠自身力量无法克服上述缺陷。它若成为中共的地方组织或派出机构，将有机会获得不竭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祖国是否收复台湾，是否接受、呼唤台湾回归，是台湾向何处去的决定性因素。

二、中共抗战时期的对台主张

中共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最初，中共中央仅以反帝反封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解决日本侵占台湾问题，没有直接要求台湾回归祖国。1931 年 6 月 2 日，台共二大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修改了《政治纲领》，提出在台建立苏维埃政权^{[1]255}。

1935 年 8 月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救国”的主张，根本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总战略，将中共对台政策引向了新的正确方向：放弃先取台湾独立再考虑是否回归祖国的路径，改由中国政府直接收复台湾。1936 年 7 月 16 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提出：“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2] 1937 年 5 月 15 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重申：“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3]

收复或解放台湾，即台湾回归祖国之意，这是抗战取得胜利的最终结果。而在抗战现阶段，中共对台政策是吸引台湾同胞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一宣言》提出“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4]524}；1935 年 11 月 28 日中华苏维埃和中革军委联合提出的“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十大纲领”和 12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主张“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4]581,609}；1937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宣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对日绝交，废除日本条约”“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5]327,329}；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提出：“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5]^[6]1939年2月14日，《新华日报》社论指出“建立包括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在内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3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建立被压迫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强调建立包括朝鲜、中国台湾等民族在内的“共同反侵略战线是当前急不容缓的任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提出“向朝鲜、台湾、安南各民族……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更加广大的宣传鼓动为建立日本内部的反法西斯阵线而斗争”，“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应当包括“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4]^[248, 251]。这个时期的中共文献仍然常把台湾同胞称作“台湾民族”，与越南、朝鲜相并列，以示不同于日本大和民族或“皇民”。临近抗战胜利时，“台湾民族”的提法放弃了，代之以“我们的同胞”“台湾同胞”。对台政策的这一转变无疑具有历史意义。

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动全面对华战争，强化对台统治，全岛实行“皇民化”运动，台胞被强迫入伍，编进皇军作战体系。在此背景下，祖国大陆成为台胞青年奔赴抗日的主战场。他们纷纷进入大陆，有的直接加入国共对日抗战，有的组织台胞抗日团体，把抗日工作与光复台湾的目标结合起来。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在台湾问题上，把发展对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来大陆的爱国台胞身上，支持他们在大后方、延安小后方、敌战区、敌后根据地及游击区从事抗日爱国活动，吸引他们同情和接近中共领导的抗日运动。许多台胞青年加入了中共，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活跃在抗日工作的各个岗位上。

1939年1月，中共浙江地下省委派出张毕来（张一之），协助爱国台胞李友邦在金华成立了第一支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满足了爱国台胞的报国热忱。4月1日，周恩来参加第三战区工作会议来到金华，听取了张毕来汇报后，即指示台湾义勇队要充分运用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并就义勇队

争取合法地位提出建议^[6]。12月29日，周恩来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提到了“在江南第三战区有台湾义勇队组织担任宣传与优待俘虏的工作”^[7]。李友邦与中共的合作一直持续到台湾光复之后。

陪都重庆是台湾进步青年集中的地方。他们多有赴日留学的经验，号称日本通、台湾通。周恩来一直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情况，尤其是政治上的进步，鼓励中共南方局工作人员与他们来往，“勤交友”“广交友”^[8]。

1941年2月9日，台湾革命同盟会（以下简称“台革会”）在重庆成立。这是一个以台胞为主体、以光复台湾为纲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汇集了各路人马。南方局给予了大力支持，《新华日报》社与台革会一些成员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台革会中有不少中共党员，还有人在周恩来身边工作。1942年4月，《新华日报》就台革会召开临时二大发表社论，指出：“自兹以后，我们必须与台湾人民紧紧地站在一起。”^[9]

抗战后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末日的临近，决定台湾命运的时刻到了。中共对台政策重点由抗日议题转向了反对国际共管台湾、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国际斗争。中共1943年1月24、25日，《新华日报》发表总编章汉夫的文章《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孤立思想的演进》和社论《战争与战后问题》，鲜明地表达中共收复台湾的坚定政治立场。1943年6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台湾，回到祖国来》，指出：“国外有少数不明历史发展，不顾实际情况，而抱有帝国主义思想的人们，曾经叫嚣一时，要将台湾从中国的母体割裂出来，高谈国际共管的谬误措置，实不值识者一笑。而且，台湾的前途，有《大西洋宪章》为最高原则，台湾的命运，决之于中国的抗战，台人的努力和各国人民对民族自决的尊重和遵守。因此我们不必与持谬见者争论不休，而应该用最大的力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10]

三、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跨海接收

台湾，中共中央即开始布局台湾，决定派遣蔡孝乾等台籍和闽粤籍干部潜入岛内，组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蔡孝乾，1928年4月当选台共中央常委，不足半年被开除党籍，罪名是逃避斗争。在没有暴露的情况下，他私自决定从岛内撤回大陆避祸。4年后，1932年4月，蔡在福建漳州加入红军，成为一名政工人员，随后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战时期，他担任了八路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1945年8月，周恩来亲自找蔡孝乾谈话，要他担任中共台工委书记，赴台主抓秘密工作。1946年7月，蔡秘密抵台，正式成立台工委。台工委其他成员还有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生，武工部长张志忠，宣传部长洪幼樵、林英杰等。

台工委隶属中共上海（分）局，具体受张执一领导。张执一是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书记，下面各系统有不少台籍或熟悉对台的闽粤籍党员，如《大公报》编委李纯青、台湾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李伟光、《真理与自由》主编陈乃昌等，方便领导国统区台湾地下工作。1946年秋到1948年底，张执一代表上海局4次赴台检查与布置工作^[11]。

上海（分）局1946年4月成立^[12]，一直工作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进驻上海后，接替了上海局对台工委的领导。

台工委的任务是：搜集台湾境内的军政情况；策反动摇的军政人员；建立地下组织；发展党组织；开展秘密政治宣传；在台东偏僻山区建立武装根据地，利用山区的天然条件，发展游击力量。省工委成员赴台后相继联络了谢雪红、简吉、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等幸存的老台共成员，把他们作为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力量，并在台北、新竹、嘉义、基隆、台中、台南、高雄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各级工委或支部，并创办《光明报》《青年自由派》。

1931年台共失败后，其成员有的牺牲、有的入狱，其他的各自谋生。台湾光复后，他们又相聚在一起，于1945年10月5日成立了台湾人民协会。为适应中共推动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呼应正在

举行的重庆国共谈判，协会将争取台湾民主作为政治纲领。10月中下旬，《大公报》主笔李纯青以记者身份来台采访，秘密会见了谢雪红、杨克煌、王万德、潘钦信、苏新、萧来福等台共成员。李纯青是中共南方局的党员，受周恩来委托，前来了解台共和台湾人民的斗争情况，并将中共的主张传达给台共成员，促进双方沟通，实际上是做中共台工委来台的先期工作。

通过双方交流，中共中央要在台建立机构并发展组织的意图不言而喻。为配合这一工作，1946年1月，谢雪红等台共成员成立了中共台湾省委筹备会。随后先期抵台的中共台工委领导人张志忠与谢雪红、杨克煌二人取得联系，了解了这一情况。6月中旬，张志忠根据中央指示在台召开了台工委与筹备会的联席会，决定解散台湾省委筹备会，其组织和成员均接受台工委领导，台工委将分别接受筹备会成员为中共党员^{[13]27-328}。

7月，中共台工委正式成立。它由大陆派遣人员和本地党员组成。本地党员并非“新共”，而是具有革命经历和受过严酷考验的“旧共”。

四、中共与“二·二八”起义

台湾光复时，南京政府接收的是一个几乎未受战乱摧残因而相对富裕的台湾。蒋介石任命亲信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为防范共产党渗入岛内，陈仪对民众实行高压政策，勒令战后成立的民间团体一律解散，重新登记。在人事上，陈仪安插亲信，排斥台湾本地人。在经济上，“劫收”了台湾全省90%的企业和70%以上的耕地，并继承日本的专卖制度，垄断了全岛的经济，用台湾经济资源支持大陆反人民的内战，造成工厂关门，农业歉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美蒋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双边协定》等一系列“协定”后，美国人拥有经营各种企业以及使用基隆和高雄海港的各种特权，使台湾的殖民地性质进一步加深，给台湾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

中国政府收复台湾本来是好事，但是蒋介石军政集团在台统治很快暴露出反人民反民主的本质。台湾光复之日成为台湾遭难之始。1947年2月27

日，台湾武装缉私人员在台北市街头打伤一名摆香烟摊的老年妇女，接着开枪打死一名群众。2月28日早晨，台北市人民罢工、罢市、罢课，纷纷走上街头，前往长官公署反映问题，遭到士兵开枪射击，三死三伤，引发更大规模反抗。台北群众捣毁了当局的商号，夺取了广播电台，号召全省人民起义响应，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台湾全境。北起基隆，南至高雄，东至台东、花莲，各地人民纷纷袭击仓库、警察所，夺取武器，进行武装斗争。新竹、高雄、台南等地人民，先后捣毁了国民党党部，占领了蒋帮军政机关。

3月2日，台北民众成立了“二·二八”起义处理委员会，以此为中心，各地迅速成立各级处委会，要求政治根本改革，实行地方自治，保证人民自由。

同日，台中市召开了市民大会，推举谢雪红为大会主席，并一度宣布成立人民政府。谢雪红发出了“武装起来，向独裁政府宣战”的命令，组织学生和市民攻下了市政当局和警察局，夺取武器，组织了人民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后被称作“第二七部队”，设有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兵力达到3000余人，转战于台中地区，成为主导“二·二八”起义的核心。张志忠在嘉义组织了另一支较大的人民武装“台湾民主联军”，包括了南部各地力量，与台中二七部队相配合，与蒋军展开激战。3月8日，蒋军两个师的主力在基隆港登陆，之后疯狂地向台湾人民展开了大搜捕和大屠杀。各人民武装坚持作战达2月之久，终于失败，遇难台胞逾万人。

3月19日，中共中央以新华社名义发出时评《台湾自治运动》，指出“二·二八”抗争是“台湾人民和平的自治运动”，因蒋介石政府的武装大屠杀而被迫自卫，发展到武装斗争；“台湾的自治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蒋介石对于台湾的统治，其野蛮程度，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台湾人民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之下的生活，比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还要痛苦。”“我们要告诉台湾同胞，你们以和平方法争取自治，和在蒋介石武装进攻之下采取武装自卫的手段，我们对此是完全同

情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

时评向台胞贡献了6条建议：（1）武装斗争既已开始，必须反对妥协，反对出卖；（2）处理委员会通过的三十二条纲领是好的，应当坚决为其实现而斗争；（3）应当立即设法满足劳苦人民的经济要求；（4）必须有坚强的政治团体来做领导；（5）必须立即训练大批的干部派到各地方去领导武装，领导政务工作，领导群众运动和经济工作；（6）这个运动的中心由大城市转到小城市和乡村中去是不可避免的^[13]。

“二·二八”起义事发突然，台工委无思想准备，力量不足，只有70余名党员。他们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自觉积极地投入斗争，在人民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带头作用。3月底，中共上海局台湾工作负责人张执一和联络员林昆从上海潜入台湾，向台工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要求“不能存在及暴露的干部应尽量撤走”。台工委作出了分散、撤退的决定，凡暴露身份的同志撤往上海，武装部队撤往山区开展游击战^[1339]。

五、中共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二·二八”起义失败后，躲过抓捕的领导人，如谢雪红、杨克煌、吴克泰、周青、李乔松、孙古平、蔡子民等，陆续撤离台湾到达国统区上海，由李伟光分别安排在旅沪同乡会、伟光医院和吴丁福、谢雪堂以及他自己家中隐匿起来^{[14]251}。旅沪同乡会是中共完全掌握的合法社团，专司两岸同胞往来事宜，暗中发挥地下交通站的作用。

1947年7月初，谢雪红、杨克煌、周青等根据党的指示赴香港开展对台工作。上海局张执一等人同船前往。在香港，张执一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决定：“飞英（即谢雪红）在这里做对台湾人民公开的号召工作，在香港成立一个台湾组直接受上海局领导，主要负责人是飞英。”^[1340]

由台湾撤到上海的“二·二八”起义的一些骨干人士陆续聚集香港。8月，谢雪红与民盟庄希泉、刘雪渔及台籍人士杨克煌、周明、施晓清、苏

新、石霜湖等成立了台湾问题研究会，发表了《台湾事变女英雄谢雪红告同胞书》，并创办《新台湾丛刊》和新台湾出版社，积极开展对台宣传。11月12日，他们在香港正式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起草了同盟《纲领草案》《规程草案》《时局口号》等文件。《纲领草案》规定，设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独立、和平、民主、自由与康乐的新中国，实行台湾省彻底的地方自治，省长、县长、市长、区长、镇长、乡长一律由人民直接选举，实行普选制度，司法绝对独立等。11月18日，香港《华商报》公布了台盟成立的消息。

台盟的核心成员谢雪红等人都是中共党员，其组织关系隶属上海局香港工作组，中共香港分局代为领导。香港分局设有香港工委，工委书记章汉夫直接领导谢雪红的工作^{[1]340}。

台盟成立后开展了反对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的活动，与一度合作的廖文毅分道扬镳。廖文毅是台湾云林人，他二哥叫廖文奎，两人都是留美学生，反对国民党对台湾的独霸统治。“二·二八”起义时，廖文毅在上海发表了措辞激烈的反蒋文章。兄弟俩成为国民党政府通缉的30名要犯中的最后两位^[15]。1947年9月，廖文毅从上海流亡香港，成立了“台湾再解放联盟”。谢雪红按照章汉夫的指示，接触廖文毅，拉他共同反蒋。后者表现出合作意愿，最终两支力量没有走到一起^{[1]342-344}。廖氏兄弟把“二·二八”起义解读为台湾民众要求独立，实则寄希望于美国，鼓吹国际托管台湾，制造“台湾共和国”。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率先予以响应。台盟的民主自治路线得到了中共香港对台工作会议的批准。7月12日，台盟宣布正式成立台盟总部，选举谢雪红、杨克煌、苏新为总部负责人。

1949年3月，台盟主席谢雪红率总部离港到达北平。在中共的支持帮助下，台盟成为团结大陆爱国同胞的全国性民主党派，谢雪红被选为首任台

盟主席。9月，台盟代表出席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新中国的创建。

六、中共香港对台工作会议

1948年6月，中共上海局在香港召开了对台工作会议，总结“二·二八”起义，全面检讨在台湾的各项工作。会议由上海局书记刘晓主持，章汉夫记录。蔡孝乾、张志忠、洪幼樵、谢雪红、李伟光等参加了会议。

张执一作关于“二·二八”起义总结的报告，指出这是台湾省人民反对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腐败统治，要求台湾省人民民主自治的斗争，不是要求“台湾独立”的斗争；这是台湾人民自发进行的抗争，台工委积极参加是正确的，党在斗争中接触到许多进步人士，为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谢雪红等人抓住有利条件，组织领导群众展开坚决的武装斗争，表现是不错的；蔡孝乾不积极争取并坚持武装领导权——让谢雪红将台中武装指挥权移交处委会——是错误的决定；台工委的组织力量薄弱，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起义失败是必然的，不能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个人^{[1]339-340}。

蔡孝乾是唯一受到批评的人。台中起义发动后，他3月4日下令把台工委刚掌握的武装力量指挥权交给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的处理委员会，认为武装斗争已基本结束，要进入政治斗争，表现出畏战心理，直到3月8日与谢雪红会面，才改口要成立全省的武装领导机构^{[16]48}。

香港会议期间，张执一另向刘晓反映，“蔡孝乾对党组织不老实，有贪图享受的迹象”，建议将其留下来。该意见未被采纳^{[1]329-330}。

会议期间，李伟光根据张执一的指示，同蔡孝乾、谢雪红等人讨论了台湾问题，认为不存在台湾民族，台湾对祖国不是民族问题。台湾只有两个前途，一是和大陆同时解放，二是国民党反动派继续盘踞台湾^{[14]252-253}。

会议提出了台湾工作的方针：“准备群众力量，扩大党的基础，以‘反美’‘反蒋’‘反官僚资本统治’，要求地方自治”，来号召团结台湾各阶层人民并进而与内地来台湾的基本群众（包

括军队)，结成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准备在全国解放战争达到全面胜利关头，武装起义解放台湾，完成台湾人民民主自治运动。”^[16]^[49]

七、惊涛拍孤岛，虎穴藏忠魂

上海解放后，1949年7月，解放台湾被提上日程。中共对台工作进入了以武装起义响应攻台战役的阶段。台工委向中央提出了《攻台建议书》，称“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4月最为适当”。1949年12月，台工委又发出“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指出：“台湾的解放更接近了”“台湾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台湾组织的任务是很迅速和切实地来准备力量配合解放军作战。”^[17]

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先后派出1500名左右的干部秘密前往台湾，从各方面搜集情报，了解情况，建立联系，进行策反。中央社会部在台湾建立了情报机构。中共福建省委、华东局等都建立了台湾工作委员会^③。三野前委也成立对台工委，由粟裕兼任书记，并在福州、厦门设立工作组（对外联络处）。时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颁行“戒严令”后，又颁布《反共保民总体战纲要》《台湾省反共保民组织办法》《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等多项严厉法令，动用大批警察、特务和军队大搞白色恐怖，中共台湾地下组织虽危陷孤岛，仍将大量重要情报送回大陆。

1949年8月，《光明报》被国民党特务破获，牵涉中共台湾“台法学院支部”“成功中学支部”“基隆中学支部”“基隆市工委支部”等多个组织遭到破坏。由此，国民党情报机关相继于1949年10月逮捕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1950年初逮捕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宣传部长洪幼樵、武装部长张志忠（其妻中共党员季芸1949年底被捕，1950年11月遭枪决）。由于蔡孝乾、洪幼樵、陈泽民等主要负责人的叛变，国民党当局在全台进行大搜捕，牵涉1800多人，处决1100余人，其中有从大陆派去的中共党员，还有许多台湾籍中共党员，如中共基隆市工委书记钟浩东、中共台北市工委书记郭琇琼、中共台大医学院支部书记

许强等。在紧急安排成员和潜台人员撤离后，林英杰被捕遭枪决，徐懋德撤回大陆。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英勇就义。

中共在台地下情报线在国民党当局的大搜捕中也遭受重大损失。最著名的是吴石、朱谌之（朱枫）案。吴石中将，被捕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赴台前已投身革命，为中共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代号“密使一号”。1949年11月，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共女党员朱枫，接受中共华东局指派，赴台与吴石接头，不慎发生横向联系，把这条线交付给了台工委书记蔡孝乾。之后，朱枫将吴石获得的绝密情报通过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送回大陆。

1950年初，朱、吴二人被蔡孝乾出卖，先后被捕。当年，吴石、朱枫以及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王正均上校和“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等都英勇就义。

刘光典和萧明华（女）也是在台湾牺牲的中共著名情报人员。刘光典，1949年接受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两次秘密潜入台湾，配合中共派台主要领导人执行任务，并送回国民党当局在台湾西海岸各军事要地驻军、防卫情况，基隆、高雄两地军事要塞通讯密码，台湾地区气象密码、海象资料等重要军事情报。在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与组织失去联系，无法返回大陆的情况下，他隐匿深山坚持了近4年时间，于1954年不幸被捕，1959年2月4日壮烈牺牲。萧明华，1948年6月被中共冀中敌工部派往台湾进行情报工作。她与其领导朱芳春，利用台湾省政府举办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举办讲习班或讲座，从中考察、培养革命骨干，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台湾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台新盟”），把讲习班中的骨干组织起来，成立了读书会。1949年6月，朱芳春回大陆汇报工作，并带回“关于台湾蒋军兵力概况”等重要军事情报。上级要求他们停止组织“台新盟”活动，将其改为“台湾工作组”（简称“台工组”），把行动转入地下，全力做好军事情报工作。朱芳春返台后，与萧明华迅速展开工作，先后报回了有关台湾及当时尚未解放的沿海岛屿军事情报数百份，其中包含“海

南岛防卫方案”“舟山群岛防卫方案”“台湾兵要地质图”等绝密战略情报，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作战部署。1950年2月，萧明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仍尽力掩护战友撤离，在狱中受尽酷刑亦坚贞不屈，于11月8日英勇就义。

2013年，经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主持建成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馆，以纪念这些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而在台湾英勇牺牲的中共隐蔽战线上的烈士。在纪念馆的花岗岩壁上刻着到目前为止、经各方查找发现的846个就义的烈士英名，并多有留白和空格，以便补刻日后发现新的英烈之名。纪念主碑文云：

夫天下有大勇者，智不能测，刚不能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朕加之而不怒，此其志甚远，所怀甚大也。所怀者何？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天下有溺者，如己之溺耳。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歿，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铭曰：呜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将兴。肃之嘉石，沐手勒铭。噫我子孙，代代永旌。

注释：

- ①彭荣，乃化名，究竟何人，学界存在分歧，可能是彭湃，也可能是瞿秋白或任弼时，本文不论。
- ②1895年5月25日，唐景崧、刘永福等人在清廷割台弃台的情况下建立了台湾民主国，英勇抵抗日本侵台达半年之久，终因独木难撑归于失败。
- ③1952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同意华东局5月5日电，将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归并到福建省委下之台湾工作委员会，华东局只在统战部内指定少数得力干部专管对台工作。

[参考文献]

- [1]徐康,吴艺煤.台湾共产党抗日史实[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5.
- [2]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M]//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3.
- [3]毛泽东.论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M]//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01.
-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6]李毕来.台湾义勇队[M]//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8辑).北京:文史出版社,1982:61.
-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第18辑)[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333.
- [8]陈乃昌.追随周恩来的岁月(1938-194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115,117.
- [9]论台湾解放运动[N].新华日报,1942-04-05.
- [10]台湾,回到祖国来[N].新华日报,1943-06-17.
- [11]张执一文集(上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140.
- [12]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M]//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一大至十四大)(增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722.
- [13]台湾自治运动[N].人民日报,1947-03-22.
- [14]台湾革命医生李伟光自述[M]//蔡子民.台湾史志.北京:台海出版社,1997:251.
- [15]褚静涛.魏道明与“二·二八”事件善后[J].现代台湾研究,2007(5).
- [16]杜继东.红白之变化——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三[M]//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17]何立波.1950,叛徒蔡孝乾与台湾地下党[J].同舟共进,2013(2).

(责任编辑：张迦寓)